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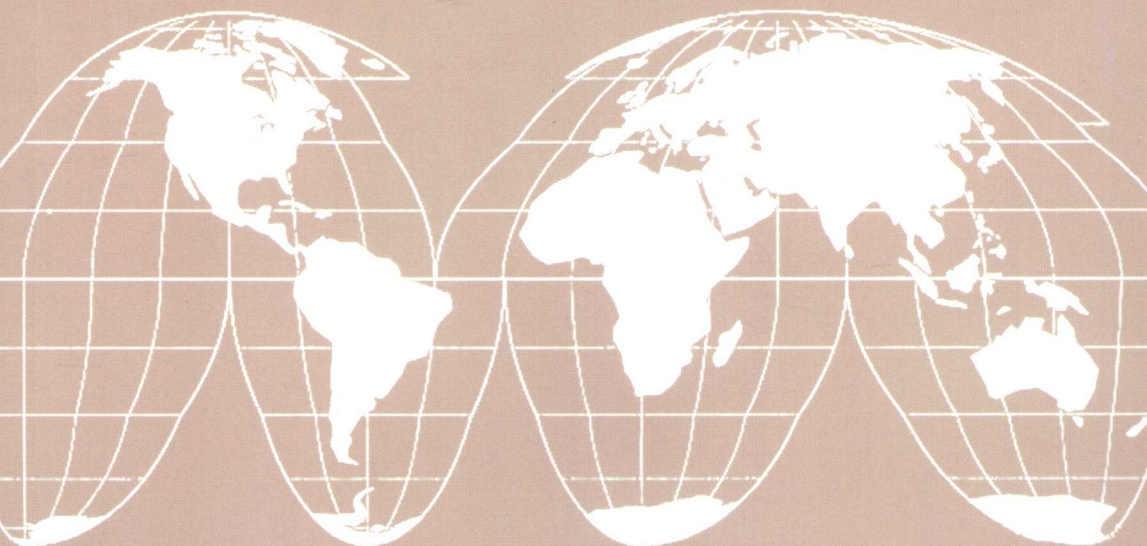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

BEIDA OUMEI WENXUE YANJIU CONGSHU

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

弥尔顿的撒旦与英国文学传统

沈 弘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

弥尔顿的撒旦与英国文学传统

沈 弘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弥尔顿的撒旦与英国文学传统/沈弘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
(文学论丛·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7082-3

I. ①弥… II. ①沈… III. ①弥尔顿,J. (1608~1674)—史诗—文学研究 IV. ①I561.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3224 号

书 名: 弥尔顿的撒旦与英国文学传统

著作责任者: 沈 弘 著

组 稿 编 辑: 张 冰

责 任 编 辑: 叶 丹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17082-3/I · 2217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4

出版部 62754962

电 子 邮 箱: zbing@pup.pku.edu.cn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5 印张 220 千字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总 序

北京大学的欧美文学研究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具有十分优秀的传统和鲜明的特色,尤其是经过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教学和科研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充实与加强,汇集了冯至、朱光潜、曹靖华、杨业治、罗大冈、田德望、吴达元、杨周翰、李赋宁、赵萝蕤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素以基础深厚、学风严谨、敬业求实著称。改革开放以来,北大的欧美文学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各语种均有成绩卓著的学术带头人,并已形成梯队,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已陆续出版了一批水平高、影响广泛的专著,其中不少获得了省部级以上的科研奖或教材奖。目前北京大学的欧美文学研究人员承担着国际合作和国内省部级以上的多项科研课题,积极参与学术交流,经常与国际国内同行直接对话,是我国欧美文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2000年春,北京大学组建了欧美文学研究中心,欧美文学研究的实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世纪之交,为了弘扬北大欧美文学研究的优秀传统,促进欧美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我们组织撰写了这套《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该丛书主要涉及三个领域:(1)欧美经典作家作品研究;(2)欧美文学与宗教;(3)欧美文论研究。这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重积累、求创新、促发展。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来系统展示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和独特视角,加强与国际国内同行的交流,为拓展和深化当代欧美文学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通过这套丛书,我们希望广大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对北大欧美文学研究的方向、方法和热点有所了解。同时,北大的学者们也能通过这项工作,对自己的研究进行总结、回顾、审视、反思,在历史和现实的坐标中研究自己的位置。此外,研究与教学是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套丛书来促进教学和人才的培养。

这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大力相助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若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这套丛书是难以面世的。

弥尔顿的撒旦与英国文学传统

北大欧美文学研究者的工作,只是国际国内欧美文学研究工作的一部分,相信它能激起感奋人心的浪花,在世界文学研究的大海中,促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弥尔顿与英国文学传统	17
第一节 英国文学传统的定义和影响	17
第二节 弥尔顿对于英国文学传统的认知和继承	22
第三节 英国文学传统植根于弥尔顿所受教育之中	37
第四节 弥尔顿的早期诗歌创作	46
第五节 弥尔顿的博览群书与诗歌创作实验	65
第六节 弥尔顿的历史研究与《失乐园》主题的形成	86
第七节 古英语研究对于弥尔顿诗歌创作所产生的影响	93
第二章 “狡诈的诱惑者”	105
第一节 魔鬼变换莫测的外表	105
第二节 “在圣洁外表下弄虚作假”	113
第三节 诱惑者的如簧巧舌	120
第四节 撒旦的诡辩和伪善	130
第三章 “为何最虚弱的反显得最英勇?”	137
第一节 撒旦的异教武士形象	137
第二节 异教武士形象的渊源	145
第三节 奥斯曼帝国的阴影	152
第四节 异教武士形象的特征	158
第五节 撒旦与基督武士形象的对比	165

第四章 罪孽的讽喻 171

 第一节 两种不同类型的讽喻手法 171

 第二节 撒旦与邪恶三位一体 178

 第三节 宗教讽喻的多层次寓意 191

 第四节 善恶混杂的理念与传统 206

结 语 220

参考书目 223

前言

有关弥尔顿《失乐园》的争论可谓是由来已久，相关的评论专著和文章早已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尽管这些争论所提出的问题五花八门，但其焦点几乎都集中在这部史诗的一位主人公撒旦身上。三百多年以来，这位虚构的史诗人物分别被不同的评论家们阐释成罪恶的化身或史诗英雄，典型的清教徒革命家或是对被处以绞刑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的影射。但在绝大多数论述弥尔顿《失乐园》的论著和论文中，撒旦几乎都被公认为是整部史诗情节发展所环绕的中心人物，而且是弥尔顿塑造最成功的一个角色。正是由于撒旦在这部史诗作品中所占据的这种中心地位，使得对于该角色人物性格的任何阐释都会影响读者对于史诗中其他角色的看法，以及对于作品中心思想的理解。因此我们认为，对于撒旦这一人物性格的正确理解对于如何欣赏弥尔顿这部伟大的史诗杰作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自从威廉·布莱克下了弥尔顿“成为魔鬼的同党而不自觉”这一著名论断^①之后，评论家们的观点似乎被导向了《失乐园》究竟应被视为是一部政治诗歌，还是一部宗教诗歌的争辩之中。在整个19世纪中，激进的“撒旦派”评论家们始终占据了上风。雪莱和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这两位是把弥尔顿的史诗视作反抗暴政之政治宣言的最坚定鼓吹者。雪莱在《诗辩》(*Defence of Poetry*, 1821)中高度赞扬撒旦这一形象：“《失乐园》中所表达撒旦这一角色的旺盛精力和性格魅力无与伦比。如果假定诗人的意图是在刻画一个人们心目中的罪恶化身那就错了。……弥尔顿笔下撒旦的道德形

① William Blake. *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 (1790—1793), Plate 5: “The reason Milton wrote in fetters when he wrote of Angels & God, and at liberty when of Devils & Hell, is because he was a true Poet and of the Devil’s party without knowing it.”

象要远远高于他所描绘的上帝。”^①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序言》中，雪莱更是直接把撒旦比作了在天国蔑视宙斯暴虐统治的古希腊天神普罗米修斯。这种观点后来在 20 世纪初英国评论家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的《弥尔顿》(Milton, 1900)一书中得到了积极呼应，作者毋庸置疑地宣称：“撒旦不可避免地使我们回想起普罗米修斯。”^②

哈兹里特也同样以最崇高的形容词来描绘撒旦这位叛逆领袖不可征服的意志和誓死反抗上帝暴政的坚定决心：“撒旦是诗歌作品中最具有英雄主义的题材，不仅他的性格刻画完美无缺，而且其整个构思也崇高无比。”^③

19 世纪俄国评论家别林斯基(V. G. Belinsky)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了上述西方“撒旦派”评论家的意见，把弥尔顿的撒旦跟 17 世纪英国的清教徒革命者们直接对应了起来：

弥尔顿的诗歌显然是时代[即英国革命]的产物：诗人在不自觉的情况下用骄傲而阴郁的撒旦这一人物形象颂扬了对于权威的反抗，尽管他的原来意图并非如此。^④

迄今已经有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可布莱克、雪莱和别林斯基的上述结论在中国的许多场合下仍然被视作对弥尔顿和撒旦形象的标准评价。

然而，上述观点只能够适用于《失乐园》的前两卷，因为只有在这儿人们才能够找到些许，假如真有的话，诗人对于上帝那位死敌所表达的同情；但是普罗米修斯的崇高英雄形象却很难跟伊甸园中伪善的诱惑者或在地狱深

① Roger Ingpen and Walter E. Peck, eds. *The Complete Works of Percy Bysshe Shelley*. Vol. VII. London: Ernest Benn Limited, 1930, p. 129: “Nothing can exceed the energy and magnificence of the Character of Satan as expressed in *Paradise Lost*. It is a mistake to suppose that he could ever have been intended for the popular personification of evil. ... Milton's Satan as a moral being is as far superior to his God.”

② Walter Raleigh. *Milto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00, p. 133: “... Satan unavoidably reminds us of Prometheus.”

③ Cited by E. E. Stoll in “Give the Devil His Due: A Reply to Mr. Lewis”, *RES*, 1944, p. 113: “Satan is the most heroic subject that ever was chosen for a poem and the execution is as perfect as the design is lofty.”

④ V. G. Belinsky.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ork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48, p. 425: “The poetry of Milton is obviously the product of his age [the English Revolution]; He himself, without suspecting the fact, depicted in the person of his proud and somber Satan an apotheosis of rebellion against authority though his intention had been quite different.”

渊中匍匐爬行的那条大蟒蛇相提并论。因此,关于在这部作品中存在着“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弥尔顿”与“作为虔诚基督徒的弥尔顿”之间矛盾的理论^①不可避免地会毁掉这部如今已经成为英国文学经典的伟大史诗作品的内在统一性。

1942年,牛津学者刘易斯(C. S. Lewis)在《失乐园·序》(*A Preface to Paradise Lost*, 1942)一书中为把弥尔顿的史诗阐释为一部基督教诗歌而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他首先强调《失乐园》作为第二手的文人史诗,具有注重仪式的风格是无可厚非的;紧接着他便坚称该史诗的中心主题和它所叙述故事的其他主要方面与正统的基督教神学理论是相一致的。通过审视诗中与撒旦有关的各种不同蜕变意象,刘易斯确认这位堕落的大天使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反面形象。刘易斯的这种基督教阐释理论对于扭转批评导向起了关键的作用,但是他并没有令人信服地解释诗歌中某些离经叛道的细节,例如弥尔顿在诗中对于神圣三位一体(即圣父、圣子、圣灵)的处理,以及对于地狱之万魔殿(Pandemonium)的描述,等等。因而后来的基督教评论家们试图用不同的方法来阐明诗中这些与正统神学不太一致的描述。

帕特里德斯(C. A. Partridges)试图给弥尔顿史诗中的基督教概念提供更为精确的命名。他在《弥尔顿与基督教传统》(1966)一书中指出,“《失乐园》并非笼统意义上的基督教诗歌,而是一部基督教新教的诗歌,那种为了取悦于天主教读者而对它进行歪曲的做法会损害它作为新教史诗的独特地位。”^②伍德豪斯(A. S. P. Woodhouse)在《天国的缪斯:弥尔顿研究导论》(1972)一书中表达了一个相类似的观点:

然而,把弥尔顿只描述成一位基督徒或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是远远不够的。他是一位新教徒。……打破偶像,个人主义,信奉理智,以及抵制传统,努力使个人的心智去适应圣经的多重复杂性等倾向——所有这些和宗教改革所带来的其他后果都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表现在弥尔

① 参见陈嘉在《英国文学史》(Chen Jia. *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 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4, pp. 289—290)一书中的评论。

② C. A. Partridges. *Milton and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66, p. 5: “*Paradise Lost* is not a Christian poem generally; it is, rather, a Christian Protestant poem, and attempts to make it doctrinally palatable to Catholic readers do violence to its unique position as the epic of Protestantism.”

顿的身上。^①

在回顾了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之后，伍德豪斯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当弥尔顿的异端邪说都得到了人们的理解和宽容之后，《失乐园》仍然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基督教诗歌。它采用了两套有关自然、恩惠和恩惠优先权的制度。它的主题是人类的堕落和失去上帝恩惠，诗中还简略勾画出一些条件，凭借这些条件，再通过上帝的干预，人类最终还是能够获得新生。”^②

希尔(Christopher Hill)在《弥尔顿与英国革命》(*Milton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977)一书中采取了一种更为中庸的观点，他一方面承认弥尔顿不仅仅是简单地继承了基督教传统，因为诗人是一位激进的新教离经叛道者，曾经拒绝过传统的基督教教条。但另一方面，弥尔顿就像大多数新教徒那样，坚持认为《圣经》是所有智慧最权威的来源，尽管他同时也意识到每个人都必须按照自己的理解来阐释《圣经》，因为“上帝……要求我们每一个希望得救的人都建立自己的信仰”^③。于是，希尔进一步认为弥尔顿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

实际上，正如索拉特(Denis Saurat)所指出的那样，弥尔顿脚踏两条船：他想要用理智来控制激情，可他并不希望排斥激情，因为没有激情他就成不了诗人。但是在自由与必要性之间的相互冲突中，弥尔顿坚定地站在自由这一边。^④

这种妥协的态度似乎成为了新近弥尔顿评论的一个共同特点，因为无论基督教或是“撒旦派”评论家们实际上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有失偏颇：前者不容易解释撒旦在史诗前两个章节中高大威武的艺术形象，而后者则割裂了撒

① A. S. P. Woodhouse. *The Heavenly Muse: A Preface to Milt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2, p. 102: “To describe Milton only as a Christian, however, or as a Christian humanist, is insufficient. He is a Protestant. ... The tendency to iconoclasm, to individualism, to a sole reliance ultimately upon reason, fostered by the rejection of tradition and the wrestling of the individual mind with the manifold complexities of the scripture—these and other outcomes of the Reformation are illustrated in Milton in an extreme form.”

② Ibid.

③ John Milton. *The Reason of Church Government*: “God ... demands of us that each man who wishes to be saved worked out his beliefs for himself.”

④ Christopher Hill. *Milton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9, p. 261.

且这一人物性格和史诗的完整结构。所以后来的评论者大都试图在这两种尖锐对立的派别之间进行某种程度的调和及妥协。但相关争论至今仍在继续。

上述有关争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考虑到17世纪英国的特殊形势,人们很难把那儿的宗教与政治割裂开来,因为英国革命说到底是天主教保皇党与清教议会党人之间的一场宗教斗争。况且,弥尔顿的史诗既不是一部神学著作,也不是一本政治小册子。作为文学艺术作品,它可以具有自己的立场,没有必要屈从于教义上的限制。诗歌的特许和诗意的发挥对于《失乐园》这样一部史诗来说是完全能够被人接受的。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在评论沃勒(Edmund Waller)的宗教诗歌时曾经下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即诗歌的本质与宗教教义的本质是截然不同的。诗歌必须“发明创造”(invention),而且它是靠“比事物本身更为优雅的方式来展示思想”来取悦读者的。但宗教教义则相反,“必须反映事物本身的原样,任何压制或补充都会造成损害”。因此从诗歌作品中,“读者有理由期望,而且从好的诗歌作品中总是能够获得,使自己的理解进一步扩充,使自己的想象进一步提升”。^①而且,弥尔顿所创作的诗歌作品与他所撰写的散文作品之间也有一个显著的不同。按照诗人自己形象的说法,他在写诗的时候感觉很自然,就像是在用右手写字,而他在写那些政论性和讨论宗教性质的散文时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感觉就像是在用左手写字。^②

所以,本文作者认为从文学传统这一角度出发来审视弥尔顿在创作《失乐园》时所受到的影响会更加令人信服,除了能够帮助我们澄清诗人的宗教信仰或政治态度之外,它还能够帮助我们欣赏弥尔顿在塑造撒旦这一文学形象上所获得的文学成就。

在一篇著名的批评散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中,T. S. 艾略特特别强调了

① Samuel Johnson. *The Lives of the English Poets*. Vol. 1. London: J. F. Dove, 1826, p. 187.

② John Milton. *The Reason of the Church Government*: “Lastly, I should not choose this manner of [prose] writing, wherein knowing myself inferior to myself, led by the genial power of nature to another task, I have the use, as I may account it, but of my left hand. ... it was found ... that had the overlooking, or betaken to of mine own choice in English or other tongue, prosing or versing, but chiefly the latter, the style, by certain vital signs it had, was likely to live.” (M. Y. Hughes. *John Milton: Complete Poems and Major Prose*, 1985, p. 667.)

文学传统那无处不在,不可割裂的重要性:

没有任何一位诗人,没有任何一门艺术的艺术家,能单独拥有他完整的意义,对于他的欣赏就是对于他与已经死去的诗人和艺术家们之间关系的欣赏。你不能够单独对他作出评价;你必须把他置于已经辞世的诗人和艺术家们中间来进行对比和比较。我所说的是一种审美批评,而不仅仅是历史批评的原则。这种遵循传统并与之合为一体的必要性并不是单方面的;但一个新的艺术品被创作出来时,它会同时影响到此前的所有艺术作品。^①

这一评论用在弥尔顿身上就显得格外的真实,因为这位诗人同时又是一个博览群书的学者,他的想象力主要来自于他所阅读过的前人作品。

弥尔顿的批评家们从一开始就已经奠定了两个具有鲜明特征的史诗传统:一个是古典史诗传统,另一个就是希伯来史诗传统。雅各布·汤森(Jacob Tonson)于1695年出版的《失乐园》对开本版中包括了帕特里克·休姆(Patrick Hume)对于这首诗歌的评论集,后者的古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的知识使他发现了弥尔顿在史诗中某些地方偏离正统圣经文本这一做法的理由。在休姆评论集的扉页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题词:“对于弥尔顿《失乐园》的评注。凡是跟这首诗歌有关的圣经文本都得以引用,诗中与旷世文豪荷马和维吉尔的史诗相平行或刻意模仿的段落也得以摘引和进行比较……”^②休姆的评注涉及了许多其他的古典作家和来自圣经传说和圣经评注传统的有趣范例,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提到了意大利诗人塔索(Torquato Tasso)与伊丽莎白时代诗人斯宾塞(Edmund Spenser)与弥尔顿史诗的关联。虽然休姆尊崇“旷世文豪荷马”(the most excellent Homer)和“仰之弥高的维吉尔”(the sublime Virgil),但他坚持认为《圣经》是弥尔顿史诗的主要创作源泉。

艾迪生(Joseph Addison, 1672—1719)是第一个使大家都关注到《失乐园》背后那个古典文学传统的评论家。1712年,艾迪生在《旁观者》(*Spectator*)杂志上发表了十八篇评论文章,来讨论弥尔顿的《失乐园》这部

① T. S. Eliot, "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 (1917). *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 ed. Hazard Adam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71, p. 784.

② Ants Oras. *Milton's Editors and Commentators from Patrick Hume to Henry John Todd (1695—1801)*. Tartu: Estonia University of Tartu press, 1931, p. 22.

伟大史诗。前六篇文章是对作品笼统的评论,而其余那十二篇则是分别针对史诗中的十二卷而进行的评论。在1月5日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艾迪生制定了对弥尔顿史诗进行评判的标准:“我将按照史诗的规则来审视弥尔顿的诗歌,并且检查一下就史诗最本质的美感而言,《失乐园》究竟在什么地方不如《伊里亚特》或《埃涅阿斯纪》。”这些规则当然就是指亚里士多德关于史诗的定义。有趣的是,在1月12日发表的第二篇文章中,艾迪生将撒旦比喻成了荷马《奥德赛》中尤利西斯所扮演的角色:“然而现在我已经提及的那位狡猾的家伙进行了一次要远比尤利西斯更长的旅行,实施了许多阴谋诡计和策略,以及用各种形状和外貌来伪装自己,所有这一切都在作品中几次被戳穿,引起了读者极大的愉悦和诧异。”在对《失乐园》的情节、人物和语言进行了综合研究之后,艾迪生在2月2日发表的第五篇文章中得出了以下的结论:“我已经将弥尔顿的《失乐园》置于寓言、人物、情感和语言这四大类项目之下进行了研究,并且显示就整体而言,弥尔顿在这四个方面均棋高一筹。”^①

C. S. 刘易斯在《失乐园·序》一书中对于古典史诗传统进行了一个彻底的回顾。他把古典史诗进一步地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是第一代史诗(folk epic)的典型范例,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则是第二代史诗(literary epic)的代表。作为基督教评论家的一位代言人,刘易斯显然也承认古典文学传统对于弥尔顿史诗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在《〈失乐园〉与古典史诗》(*Paradise Lost and the Classical Epic*, 1979)这部关于古典史诗传统的更新研究论著中,布莱辛顿(F. C. Blessington)从一个新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考察。他发现弥尔顿并没有按照古典史诗中描写英雄的规则来塑造撒旦这位叛逆天使:“撒旦正好是对阿喀琉斯的颠覆,他是一位具有雄辩口才,但却缺乏真正战斗能力的武士。”^②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圣子基督在天国之战中则表现得像一位真正的古典史诗英雄,因为身穿盔甲的基督再也不是在天庭中为拯救人类而进行调停的那位勇于做出自我牺牲的谦谦君子,而是一位比阿喀琉斯甚至更

① 关于上面所引用的艾迪生评论,请参见 James Thorpe, ed. *Milton Criticism: A Collection in Four Centuries*. New York: Octagon Books, Inc., 1966, p. 23, 30, 44.

② F. C. Blessington. *Paradise Lost and the Classical Epic*.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9, p. 10.

为威猛的武士。所有这一切都被布莱辛顿用作证据,来证明他在该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的观点:

并非像评论家们所通常认为的那样,他[弥尔顿]援引古典史诗的范例是为了取而代之,而是为了显示,按照荷马和维吉尔定下的标准,撒旦并没有达到一位史诗英雄的标准。简而言之,撒旦只是对于阿喀琉斯、奥德赛和埃涅阿斯的一种模仿嘲弄。^①

芭芭拉·莱瓦尔斯基(Barbara K. Lewalsky)在《〈失乐园〉与文学形式的巧辩》(*Paradise Lost and the Rhetoric of Literary Forms*, 1985)^②一书中重复了同样的观点。在该书中,莱瓦尔斯基首先介绍了古典文学中各种不同的文学体裁,因为弥尔顿是把维吉尔作为自己的榜样,在年轻时期尝试了几乎每一种古典文学形式,直到最后才开始动笔写《失乐园》这部伟大史诗的。其结果就是《失乐园》拥有一个气势磅礴,包罗万象的庞大结构,其中包含了好几种不同的风格和文学体裁。作者详细地分析了该诗第二卷“群魔殿”中的辩论,通过用古典修辞学的方法对于各位魔头的发言进行对比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撒旦这位阴险狡猾的叛逆天使首领始终操纵了话语权。接着她又按照古典史诗的惯例对撒旦的人物性格进行剖析,发现在他的身上尽管能够找到力量、勇气、坚忍不拔、决心、耐力和领导艺术等品质,但是他却并没有真正达到一位古典史诗英雄的标准。这个结论恰好跟早先一位弥尔顿评论家斯特德曼(J. M. Steadman)的观点不谋而合,后者指出撒旦由于自身的野蛮残忍(brutishness)而无法满足文艺复兴时期对于一位史诗英雄的道德标准。这是因为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伦理道德家和文学批评家们大多都信奉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第三卷中对于英雄美德的定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定义,英雄是超人、崇高和神圣的,应该具有众多的美德,而“野蛮残忍”则跟罪孽有关。^③

自从20世纪以来,《失乐园》中另一个主要的文学传统也越来越受到更

① F. C. Blessington, *Paradise Lost and the Classical Epic*.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9, p. 1.

② B. K. Lewalski. *Paradise Lost and the Rhetoric of Literary Forms*. Prince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③ J. M. Steadman. *Milton's Epic Hero*.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8, p. 24 ff.

多评论家们的关注。希伯来文学传统和基督教早期教父权威们被认为对弥尔顿史诗的创作施加了重大的影响。对于圣经故事来源的研究揭示出圣经典故及其相关的文学作品对于弥尔顿史诗中主要故事情节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创世记》第2章为《失乐园》中亚当和夏娃的堕落提供了故事来源,而《启示录》第12章则以象征性的语言讲述了撒旦和叛逆天使们的堕落。《失乐园》第二卷中关于“罪孽”和“死亡”的讽喻主要来自《雅各书》第1章第15句。^①除了《旧约》和《新约》之外,还有1611年钦定本圣经所包含的《次经》(*Apocrypha*)。正如汉福德(J. H. Hanford)所指出的那样,《次经》故事受到了弥尔顿的高度关注,并且在《失乐园》这部宗教史诗的写作中为诗人提供了许多创作灵感,尤其是《以诺书》(*Book of Enoch*),后者提到了叛逆天使们被打入地狱,以及撒旦麾下一名旗手,即亚萨色(Azazel)的名字。还有《托比特书》(*Book of Tobit*),书中提及大天使拉斐尔是一位热心助人的向导,曾陪伴该书的主人公托比特经历了好几次冒险。^②

弗莱彻(H. F. Fletcher)在他的两部早期论著^③中首先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了犹太教拉比们对于圣经故事所做的评注。他后期的一部主要作品,《约翰·弥尔顿的思想发展》(*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John Milton*, 1961)也用了专门的章节来讨论这个问题。弥尔顿在把撒旦诱惑夏娃的神话演绎为一个颇为吸引人的故事时对于这些犹太教拉比们的评注肯定会颇感兴趣:例如这些评注中提及撒旦因亚当的婚姻幸福而感到嫉妒,以及撒旦试图用诡辩来使夏娃相信禁果是有益无害的,因为他自己就吃过禁果而没有死亡,而上帝禁止人类尝禁果的真正动机是嫉妒。弗莱彻宣称,弥尔顿对于这些《塔木德经》故事(Talmudic writings)了如指掌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他在散文作品中经常提及它们。在他的第三部论离婚的小册子《泰特拉考登》(*Tetrachordon*)中,弥尔顿显然接受了关于亚当最初具有两种性别特征这一由犹太教拉比们所提出的理论。弥尔顿还非常熟悉中世纪犹太教拉比迈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 1135—1204)的著作,以及由约瑟

① *New Testament*, James 1:15; “The his [Satan’s] evil desire conceives and gives birth to sin; and sin, when it is full-grown, gives birth to death.”

② J. H. Hanford and J. G. Taaffe, eds. *A Milton Handbook*. New York: Meredith Corporation, 1970, p. 203.

③ H. F. Fletcher. *Milton’s Semitic Studi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6. —. *Milton’s Rabbinical Reading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30.

夫斯(Flavius Josephus, 37/38—100)和约西庇(Yosippon)撰写的犹太人历史。在一篇发表在《语文学研究》(*Studies in Philology*)期刊的文章中,弗莱彻还论证弥尔顿许多描写撒旦诱惑夏娃那一场景和上帝与亚当之间的对话等许多叙述故事的细节也许是从约西庇或其他犹太教拉比们的评注那儿直接拿过来的。

C. S. 刘易斯在《失乐园·序》(1942)一书中证明了圣奥古斯丁是弥尔顿阐释《圣经》故事时所依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威,尤其是关于人类堕落和揭示撒旦本质的故事。这个话题在其他几位更为新近的评论家论著中也有讨论。在《弥尔顿与奥古斯丁,〈失乐园〉中的奥古斯丁思想模式》(*Milton and Augustine, Patterns of Augustine Thought in Paradise Lost*, 1981)一书中,菲奥里(P. A. Fiore)对于这一特定的影响成功地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评论家们还试图找出其他中世纪基督教教父们的思想对于弥尔顿这部史诗的影响,因为在但丁的《神曲》和其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作品中有许多关于这些思想的讨论和评论,而弥尔顿对于所有这些作品显然是了如指掌的。例如汉福德指出,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的《叙利亚神祇》(*De Diis Syriis*)为弥尔顿对于魔鬼的描写和性格刻画提供了许多实例。^①

对弥尔顿具有影响的另一部文艺复兴时期杰出宗教作品是法国诗人迪巴尔塔(Du Bartas)的《第一周》(*La Premiere Semaine*)和《第二周》(*La Second Semaine*),由乔舒亚·西尔维斯特(Joshua Sylvester)译成英语后的题目是《迪巴尔塔的创世周及其劳作》(*Du Bartas His Weekes and Workes*)。泰勒(G. C. Taylor)在《弥尔顿对于迪巴尔塔作品的使用》(*Milton's Use of Du Bartas*, 1934)中提出,由西尔维斯特译成英语的《迪巴尔塔的创世周及其劳作》对于弥尔顿的影响要比任何一本其他书都更大。这个论断当然有一点夸大的成分,因为泰勒本人也承认,在《失乐园》的好几卷中,我们找不到任何迪巴尔塔影响的迹象。^②然而,泰勒在书中挑出了众多平行的描写和用词的相似,其中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撒旦所扮演的诱惑者这个角色身上。

关于希伯来文学传统对于弥尔顿《失乐园》影响的最全面研究也许要数

① J. H. Hanford and J. G. Taaffe, eds. *A Milton Handbook*. New York: Meredith Corporation, 1970, p. 206.

② G. C. Taylor. *Milton's Use of Du Bartas*, 1934, p. 72: "The magnificent Satan of Books I and II of *Paradise Lost* shows no signs of the influence of Du Bartas"; p. 85: "There appear to be no borrowings from Du Bartas in Book VI", etc.